

讀書運動輔導叢書

談談“困難的形勢”

田 遨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0(7)3-623

12
(1)

264
45

讀書運動輔導叢書

談談“困難的形勢”

田 遨 著

匈牙利当代有名作家埃諾·烏尔班寫的中篇小說“困难的形势”，已經由新文藝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作品在“文匯報”逐日連載的时候，我就曾閱讀过，它留給我很深的印象。在我國整風、反右斗争期間，我也引用过这篇小說的事件、人物，來駁斥右派分子歪曲匈牙利事件真相的謬論。

事情过去一年多了，小說看过也有一年多了，但这部作品的場景、人物形象还鮮明地活在我的心头。这因为作者所反映的是一个巨大的主题，一个驚濤駭浪、震撼人心的事件，一个尖銳的階級斗争反映到國際斗争中的嚴重事变。当时，透过事件本身所包含的極大复雜性，透过國際帝国主义的誹謗毒霧，透过某些右派言論所散播的灰塵，这部作品揭示了匈牙利事件的問題的實質，起了有益的作用。

这部中篇小說，是反映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在这本書里，充分顯示了：作者有尖銳的政治敏感，有深刻的洞察力；他以有力的筆触，形象

化的語言，描繪了在匈牙利事件中，匈牙利西部一个边陲小村所發生的一切。

作者埃諾·烏尔班生長于匈牙利西部一个農民家庭，当过鄉村教师，一九四四年他从反动的霍尔蒂軍隊中逃出來之后，成为匈牙利的共產黨員，后來就担任了他出生的那个薩瓦村的黨組織書記。在他担任党的農民周报“自由土地”的記者之后，他几乎走遍了全國三千个鄉村，所以他非常熟悉匈牙利的農村情况。他是匈牙利作家协会的書記处書記，他在匈牙利修正主义的黑潮到处泛濫的时候，一直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上和修正主义進行不調和的斗争。后來他受到排斥，被修正主义分子解除了他的作家协会書記处書記的职务。一九五六年十月期間，他正住在國內，是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的目击人。由于他个人有这样的斗争經歷和政治思想水平，所以他寫起匈牙利西部一个鄉村的暴乱經過來，就寫得特別尖銳、真实、生动。他以刻骨的憎恨勾划了反革命匪徒的丑惡嘴臉，也以巨大的激情歌頌了革命战士和普通農民的高貴品質。他只寫了暴乱事件的一角，但是反映的面却是繁复而廣闊，几乎是反映了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的全部过程。

这部中篇小說的故事是这样：在布达佩斯反革命暴

乱發生后，匈牙利西部边陲一个反革命势力代表人物、从農村中被農民赶出來的首席公証人馬沙特認為报仇的机会來了，他和他的兒子若尔丹回到M村，准备在那里恢复一九四六年以前的地主統治。他糾合了一批沒有肅清的反革命分子，形成了一个拥有武器裝備的反革命集团。他們抓走了“陀日”農業生產合作社主席福尔加奇，并对福尔加奇進行“審訊”，只是在社員的憤怒包圍下，才被迫放了他。他們用各种惡毒方法進行煽动和挑撥，企圖瓦解農業生產合作社。最后，他們甚至想用暗殺、搶劫等手段來达到目的，但这些都沒有成功。当他們策划了一个更大的陰謀准备行动的时候，苏軍的坦克開來了。那雷鳴一般的轟隆声，終於惊破了反革命分子的白日夢。

小說一开头，作者就用叛乱分子自己供認的“馬戲团開場啦”这句玩笑，給發生的反革命暴乱以極為辛辣的諷刺。反革命匪徒是一群毫无人性的兩足动物。他們对劳动人民咬牙切齒，对國際帝國主义搖尾乞憐，他們是匍匐在國際帝國主义鞭子下扮演馬戲团中动物的角色。他們成立了“外多瑙政府”，配备了“刮刮叫的克虜伯冲锋槍”，他們要依靠聯合國來对匈牙利進行干涉，最后，他們看到大勢已去，还是向國外一溜，投奔它的西方主子去了。在小說中，沒有直接描寫國際帝國主义的陰謀干涉，只有类似上述的有暗示性的寥寥数筆。然而，这样簡略的几筆，却已經把反革命势力和國際帝國主义的相互

勾結揭示出來，它使我們明白了匈牙利事件的背景和性質。

說到這里，為了更好地理解這部小說的思想性、政治性，有必要先弄清楚匈牙利反革命暴亂事件的背景和性質。國際帝國主義的宣傳機器，是極力掩蓋匈牙利事件的背景並極力歪曲它的性質的。它們造謠說，匈牙利事件表明“匈牙利人民群眾反對人民民主專政”。南斯拉夫的現代修正主義者也附和說，匈牙利事件是人民群眾反對拉科西奉行“斯大林主義”的結果。我國某些右派分子也認為這表明政治制度有缺陷；暴亂所以發生，主要是內因造成的。這些歪曲事實的胡說，都是對人民民主專政制度的惡毒攻擊。

說匈牙利人民群眾“反對人民民主專政”，真是一個彌天大謊。事實是，有人反對人民民主專政，但那不是匈牙利人民，而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說什麼拉科西等人奉行所謂“斯大林主義”，更是無恥的謊話，這只不過是南斯拉夫叛徒們誹謗人民民主專政的一種借口。說匈牙利事件主要是內因所造成，是拉科西等人的官僚主義所造成，也在極大程度上歪曲了問題的實質。

我們並不否認，在發生匈牙利事件之前，匈牙利的黨和政府領導人拉科西、格羅等人都犯了不少錯誤：他們機械地搬用蘇聯工業的經驗，脫離實際；對反革命分子沒有堅決鎮壓，人民內部的民主沒有擴大，跟不上形

勢；对群众关心和信任不够，离开了群众路綫；还發生了个人崇拜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不良現象。这些，都大大削弱了党的威望和影响。但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却絕不会飲鴆止渴，絕不会因为要糾正政府的这些錯誤而同意推翻自己的政权。匈牙利人民看到了錯誤，但他們更不会忘記在解放后短短十一年多的時間內，匈牙利在各方面取得了多么驚人的成績。地主、資本家的反动統治早被推翻，人民民主制度早已建立起來，三年計劃之后，紧接着是第一个五年計劃，在建設的热潮中，已使匈牙利的面貌完全改觀。一九五五年的工業產值已經比战前一九三八年增加了兩倍半。曾經被称为“三百万乞丐的國家”，再找不到一个乞丐的影子了。在这个越变越美丽的國家里，失業現象也已基本消除。

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改善了。难道匈牙利人民会容許地主、工厂主、旧法官、佩帶箭十字的法西斯分子夺走劳动人民的革命果实，騎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嗎？难道匈牙利劳动人民会反对保障自己的劳动成果的人民民主專政嗎？

那末，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布达佩斯的大游行，不是表明了很多群众已捲入暴乱漩渦了么？是的，是有群众参加了游行。但是問題不在于群众参加了游行，而在于反革命分子趁火打劫地利用了游行这个“机会”。参加游行的絕大多数群众，想也沒有想到会被人利用來進行

反革命活动。不錯，这的确是一个使人痛心的事实，就是大多数游行者都不自覺地做了反革命分子的盲目工具。但誰要从这次游行中得出匈牙利人民“反对人民民主專政”的結論，那就大錯特錯了。事实是，如果没有反革命势力一开始就混入游行的群众队伍之中，那就根本不可能發生如下的情况：群众游行剛剛开始了三小时，剛剛到了晚上，在游行群众周圍，突然出現了数十輛卡車，載來了早已准备好的武器和彈藥。在游行队伍中也出現了原來沒有的反对人民民主專政、反对苏联的口号。馬路上的路灯被打坏，沿街一片漆黑。游行的性質完全变了。武裝匪徒趁着这混乱的当兒，占据了多瑙河切佩尔島上的一个兵工厂，并在街上布滿崗哨，并用卡車把武器运到預定地点。这一切，难道是具有善良願望的普通游行者能够做得出來的嗎？不是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它的策划者是一个有經驗的老手嗎？之后，武裝匪徒分股占領了苏科特电台，裴多菲电台和火車站，开始進攻議會大厦，霍尔蒂时代的軍官甚至拿着轉盤槍，要逮捕匈牙利人民共和國主席团主席道比和國民議會主席罗奈伊。布达佩斯和外地的反动軍官，也燃起了白色恐怖的火焰，到处屠殺共產黨人和忠实于人民政权的劳动人民，这难道不是經過事先周密布置、而是从游行队伍中自然發生的嗎？

說到拉科西等人犯了重大錯誤，那是沒有疑問的，但

那是哪一类的錯誤呵。那完全不是南斯拉夫叛徒們所攻击的那类“錯誤”，而是，除了前面所談到的一些錯誤之外，更重要的，他們沒有沉重地打击反革命勢力，沒有強有力地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职能。在黨內，他們也損害了黨的純潔性，竟大開方便之門，讓那些階級異己分子、沙文主義分子、投機分子、以及各式各樣的野心家，大量滲入黨內，使黨陷于瓦解狀態；而且，他們也沒有從根本上肅清修正主義的腐化影響，竟讓以伊姆雷·納吉和格佐·洛齊松為首的反動分子發了芽，生了根。

匈牙利事件主要是內因造成的呢？還是主要是外因造成的？關於這一點，我們當然同意外因只有通過內因才能發生作用這一科學論點，但這一科學論點不是抽象的，它必須結合具體事件進行具體的分析。某些右派分子強調內因（有的是故意誇大匈牙利黨和政府的錯誤），故意的抹煞外因，為國際帝國主義策劃匈牙利反革命暴亂這一極為重要的外因打掩護。很明顯，他們的論調是為他們的反動的政治目的服務的。

必須認識到，匈牙利事件是在這種基本情況下發生的：一個國家內部的階級鬥爭和國際上兩大陣營的鬥爭已緊密地糾結起來。在我們這一邊是：無產階級、廣大勞動人民、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在敵人的一邊是：各種剝削階級、反動派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偉大的蘇聯和匈牙利勞動人民

是穩固地站在一条綫上的，而形成匈牙利事件的外因的國際帝國主義，正是通過作為內因的反革命分子策劃反蘇反共的活動的。這是無可置疑的，帝國主義存在一天，它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顛覆和破壞活動就一天不會停止。

還可以回到那句話上去：外因必須通過內因才能發生作用。作為外因的國際帝國主義的顛覆和破壞活動，究竟能發生多大作用，就要看內因如何，就要看這個國家的黨和政府所執行的政策是否正確。如果匈牙利的黨和政府不犯錯誤，或者少犯錯誤，或者發現錯誤後能夠及時糾正，更重要的是，能夠肅清反革命殘余，使它不致於成為國際帝國主義策動暴亂的溫床，那麼，暴亂事件是可能防止的。

但是，絕不能因此而得出抹殺外因的內因論。不信，讓我們還是擺事實、說道理吧：洋洋得意的美國間諜頭子艾倫·杜勒斯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溜了嘴，他說：事先我們就已經知道匈牙利的暴動。這倒是放火賊的自供！他怎麼能夠不知道呢，在十月二十三日以前，受美國情報機關津貼的匈牙利反革命亡命分子就已從美國趕往歐洲，逗留在匈牙利的邊境上。長久以來人們不知其生死存亡的舊匈牙利的老牌血腥獨裁者霍爾蒂，也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出現了，他表示願回來為他的階級效勞。罪大惡極的另一反動頭子、和伊姆雷·納吉同姓的費倫茨·納吉也跑到維也納，夢想趕回布達佩斯，重溫踏上總理寶座的旧

夢。在慕尼黑、薩爾斯堡、格拉茨、林嗣、維也納和其他西德、奧地利的大小城市里，好些流亡者中心組織起來了，而且活動得非常猖獗。慕尼黑的“自由歐洲”電台總部，老早就成立了一個招募辦事處。天哪，它是招募些什麼貨色呀！它招募的是霍爾蒂的軍官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亡命匪徒，它把他們偷偷運進匈牙利。還有許多西方飛機也在布達佩斯着了陸。注意！這些飛機名義上是裝載醫藥用品來的，據說是“匈牙利人急需的血漿、綑帶和藥品”，可是，當時奧地利的“人民之聲報”就已經揭露說，這並不是什麼藥品，“如果用這麼多飛機運送藥品，這些藥品就會夠整個歐洲用的。”那麼，在藥品的標籤底下是些什麼貨色呢？是護送“藥品”的霍爾蒂的舊軍官和士兵，是藥品箱里裝滿了的大批武器和炸藥。這就是西方“慈善家”在匈牙利暴亂中的“慈善”措施。

說到這裡，外因在暴亂中所起的作用是很清楚了。如果還有人一定要“打破砂鍋問到底”，問我：主要是外因呢，還是主要是內因？那麼，我們從文件中引一段話來回答這個問題吧！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由“人民日報”編輯部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寫成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講得很明確，這篇文章寫道：

帝國主義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

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正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所说，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而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匈牙利事件的背景正是如此。谈到这里，匈牙利事件的性质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发表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决议说：

匈牙利十月二十三日的武装暴动从根本上来说带有什么样的性质，它是革命还是民族革命，对于这个问题，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只有一个回答：这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这是反革命。

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把反革命化装成匈牙利人民，把暴乱说成是人民民主专政有问题、是人民反对它的结果。这类谎言，在匈牙利事件刚发生及其以后的一些日子里，都发生过危险作用。“困难的形势”这部小说的思想性、政治性也就表现在这里，它有力地戳穿了所谓匈牙利“人民群众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弥天大

謊。

匈牙利的劳动人民不僅是不反对人民民主專政，而且当國際帝國主义和反革命勢力互相呼应、鬧得烏烟瘴气的时候，他們是始終站在捍衛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前列的。关于后者，在这部小說中也有充分的反映。

小說中着力描寫了广大人民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鮮明的政治态度。当反革命勢力代表、首席公証人馬沙特“審訊”合作社社長福尔加奇的时候，这位首席公証人先生朝窗外望了一眼，看到“整个花園黑压压地挤滿了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守候着的合作社社員”，这时候，他慌乱了，“審訊”不下去了。社員們从危險境地中救出了福尔加奇。在这个場面里，作者充分顯示了劳动人民对集体事業的热爱，对代表党的革命战士福尔加奇的爱护与关怀。又有一次，反革命分子叫霍洛去撞鐘，使全村的人听到鐘声都起來了，一个臉上有伤疤的反革命分子“一溜烟”开始煽动大家，他污蔑合作社的黨員干部都領到了別墅和花園洋房，污蔑他們是“獄卒”和“秘密警察”，他估量这一下，准把“福尔加奇和那些丑八怪吓出一褲子尿來”。可是，挤得水泄不通的群众，开始沉默着，后来明白了，他們憤怒地把帶有武器的这一小队匪徒包圍起來，直使那帮匪徒“四散奔逃，有的竄向棚舍，有的藏到風磨后面，民族近衛軍們趁農民还没把他們撕成碎片之前，赶紧夺門逃竄”。

是人民群众保衛了合作社的黨員干部，保衛了他們自己命运所繫的合作社。是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使自命为“恢复公理和爱國主义的神聖的先鋒、使者和火炬”的反革命分子若尔丹，也突然感到噁心欲吐，不得不承認他自己的“信仰是盲目的”：“M村的革命事業已搞臭了，变得庸俗和无聊了，而最难受的是变得卑鄙下流了”。

在这些火辣辣的場景中，作者都以富有色彩变化的筆，渲染出了那些复雜、混乱而又旗帜鮮明的斗争画面。他歌頌了劳动人民的集体力量，这一种力量，使反革命分子也感到“M村的事業已經搞臭了”，这是战勝邪惡的正义力量。

伊姆雷·納吉的上台，大大助長了各式各样反革命匪徒的凶焰。他庇护、縱容暴乱以至于直接鼓励暴乱，从而成为典型的工人階級的叛徒。这一点在这部小說中也有了反映。

作者寫道：

兩天，三天过去了……，电台时而广播，时而緘默；有时是悲愴的小調，有时是雄壯的進行曲。伊姆雷·納吉的第一屆內閣倒台了，第二次又垮掉。呼吁書和傳單滿天飛。政府在訴苦，在祈求，要飯似

的乞取服从，只有聾子才沒理會到這一點。

秋收工作仍然按步就班進行着，人們操作不息。福爾加奇忙得連吃飯睡覺都沒有定時，但還是經常收聽電台廣播。因為他的肩上擔負着合作社千余名社員的安全，所以愈來愈經常地嚴肅考慮到：布達佩斯的暴亂究竟為了什麼目的？用意何在？如果它把政府搞垮，或者更糟得可怕，萬一納吉政府開倒車，允許舊社會復辟的話，該怎麼辦？

這些問題並沒有找到答案。確切些說，它們被一種想法沖淡了：納吉畢竟不是別人，而是一個共產黨員啊。不錯，伊姆雷·納吉初任總理的時候，他是不重視生產合作社的，他認為合作社是不值得重視的拖油瓶。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納吉是不可能叛變，出賣社會主義事業的，……只要好好想一下就行了，今天的世界並不是一九一九年八月那些頭插鵝翎的反動軍官耀武揚威的時代可比了。

這是一個十分混亂的局面！但在各種電台廣播和蜚語流言后面包藏着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事實。反革命匪徒在猖狂活動，而這個小村的勞動人民和普通黨員，正在一面警惕地注視着事態的發展，一面又對納吉政府抱着疑信參半的心情。伊姆雷·納吉的罪惡也正在這裡，他公然包庇匪徒，支持叛亂，而又披着一件“共產黨員”的外

衣，麻痹着正直而誠實的人們。

伊姆雷·納吉在匈牙利暴亂中扮演了一個可恥的而又極其重要的角色。早在一九五三年，伊姆雷·納吉的周圍就形成了一個右翼集團。他們公開傾向於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和政治主張。伊姆雷·納吉提出了匈牙利無產階級的“特點”，照他說，這些“特點”就表現在他所說的“九百五十萬匈牙利人的思想一致性”。他從這種“理論”出發，認為這一“特點”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鎮壓職能是不相容的。這實質上，是抽去階級的內容，否定無產階級專政，解除工人階級和黨的武裝，並為和國內殘余的反革命勢力取得妥協作了準備。同時，納吉集團不承認黨的領導作用，他認為“愛國人民陣綫應該是國家的靈魂”。這樣把黨的領導作用一脚踢開。納吉集團內重要人物之一山多爾·諾沃巴西基還公然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指導作用，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只能是“精神上的滋補品”。嘿，什麼“滋補品”！他們已經把作為黨和無產階級革命者行動指南的偉大理論作為點綴品了！還有，納吉集團還提出了“純粹民主”和“全民自由”的口號，這是什麼性質的口號呢？這是典型的修正主義的口號、是反動的口號。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情況下，只能實行社會主義的民主，就是勞動人民內部的民主，而對社會主義的敵人，只能實行專政。抽去階級內容要求抽象的“民主”和“全民自由”，只能有利於敵

人，有助於他們實行復辟。納吉集團還有一個罪惡主張，就是取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而宣揚什麼“民族的共產主義”，這也正是南斯拉夫鐵托集團的荒謬論調。納吉集團就用這種修正主義的論調，在人民群眾中煽動反蘇情緒。

問題是這樣清楚：在匈牙利國內還潛伏着不少殘余反革命勢力（當然還有帝國主義從國外運來的反革命力量），在黨內又有一個納吉集團作為策應，他們互相配合；在國際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匈牙利反革命暴亂的幕就揭開了。

匈牙利的正直而誠實的人們，上了納吉集團很大的當。連福爾加奇在開始懷疑納吉究竟是什麼人物的時候，也免不了要想到：“納吉畢竟不是別人，而是一個共產黨員呵。”這種看法曾使福爾加奇暫時定下心來。可是，叛徒的嘴臉是遮掩不住的，當伊姆雷·納吉“延見蘇聯駐匈牙利大使安特洛波夫先生”的時候，福爾加奇的眼睛終於擦亮了。“先生”，不過是一個輕微的字眼，但是，“連上帝在匈牙利也稱同志，而蘇聯同志，駐匈大使反成了先生！”這樣的情況，不能不刺痛福爾加奇的心，也使他改變了對伊姆雷·納吉的盲目信任。

在作者的筆下，福爾加奇是一個使人難忘的人物。他